

西方著名社会学家思想研究丛书

FAMOUS WESTERN SOCIOLOGIST

SERIES

格奥尔格·齐美尔：

现代性的诊断

成伯清 著

丛书主编 冯钢

Georg Simmel

杭州大学出版社

GEORG SIMMEL

格奥尔格·齐美尔：

现代性的诊断

成伯清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格奥尔格·齐美尔:现代性的诊断/成伯清著. —杭州:
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9. 6
ISBN 7-81069-006-X

I . 格… II . 成… III . 格奥尔格·齐美尔—社会学—
思想—研究 IV . C9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9560 号

责任编辑:余健波

装帧设计:张 磊

格奥尔格·齐美尔:现代性的诊断

成伯清 著

*

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天目山路 34 号)

*

杭州大学出版社电脑排版部排版

浙江印刷集团公司印刷

850×1168 1/32 6.75 印张 157 千字

1999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3500

书号:ISBN 7-81069-006-X/C · 002

定 价:11.50 元

总序

学术的发展，并不是一个单纯的逻辑过程，并非像一般人们想象的那样是对一个客观实在循序渐进的发现，且不断往其中添加新的内容。学术发展，正如熊彼特所说，是我们与自己以及我们前人头脑中创造的东西进行无休止搏斗的过程，每一个进步都是在新思想和新需要的冲击下，受着新一代人的偏好与气质的支配。因此，任何对学术现状的把握实际上都是在把握为历史所规定了的方法、问题和结果，只有对照其所由产生的历史背景来考察才会有意义。换言之，任何时候的任何学术状况，都有隐含着它过去的历史背景，如果不了解这种隐含的历史，就不可能真实地表述这种学术状态。

因此，就思想或学术而言，了解其历史最有效的途径，应该说就是认识经典。当然这并不是说经典就构成了思想史或学术史的全部，而是说，经典以最浓缩的形式承载了历史上不同时代人类思想和智慧的积淀和结晶。具体落实到社会学这个领域，结识自这门学科正式诞生以来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中的那些新老大师们，体验他们对现实的感受方式，了解他们认识观察其所处社会的视角和方法，熟悉他们的观念和思想，对于今天的社会学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对于今天的社会学者们认识研究其所置身的社会，应该说同样也是大有裨益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环

节。而这,可以说,正是我们这套丛书的初衷所在。

如果说,社会学的基本宗旨是对人类社会及其运行规则或状况的认识、探索和反省,那么,经典文本(classic text)就是这些新老大师从其特定的立场、问题出发对其所处的特定社会进行认识、探索和反省的结果。因此,就会有这样一个问题:这种从特定的立场、问题出发的对特定社会所作的认识、探索、反省,是如何与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相关联的?换言之,那些基于特殊性的文本如何显示出它超越特殊性的意义?这里牵涉到对于文本的两种解读方式。P. Ricoeur 曾对言说话语和书写文本作过一个区分,他认为,言说(speech)是一个事件,而书写下来的不是言说(saying),而是所说(said),因此,通过书写,作者原本的旨意和文本的意义不再完全契合,文本的命运开始独立于作者的生涯,文本也独立于言说的直接指涉。由于文本和言说的这种区别,就产生了对文本的两种不同倾向的解读方式:一种是高度情境化(hypercontextualisation)的解读方式,另一种是去情境化(decontextualisation)的解读方式。前者力图从作者所处的(也即文本所由以产生的)具体社会情景和脉络中来理解把握文本,尽可能将文本还原为作者的言说,从而领会作者的本意;后者则与此相反,解读者倾向于从自身的问题关怀出发,超越文本所产生的具体的、特殊的社会情景和脉络,从中抽象出较具普遍性的、可以移置并洞亮其他社会情境的内在理路。我们认为,第一种解读方式可以驱除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隔阂而笼罩于文本之上的尘埃迷雾,第二种解读方式则可以使产生于其他时空中的文本联系于当下的现实生活。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从总的倾向上看,这套丛书的作者所采用的主要是一种解读方式。原因其实也很简单,第一种解读方式是第二种解读方式的前提和基础;在不理解或误解作者原

旨的情况下即对文本进行普遍性的抽象或直接套用、移植文本中的术语、概念,如此郢书燕说的结果,往往会有张冠李戴、变桔为枳,从而发生怀特海所说的“错置具体感”的谬误。况且,就第二种解读方式而言,它往往受到解读者所关注的具体问题和所由出发的立场的影响。因此,作为这套丛书的作者,在认真完成第一种解读之后,大可让读者从他们自己的具体感出发进行第二种解读,这样,至少也可以使我们免除越俎代庖之嫌。

目 录

序 论	(1)
第一章 学院里的局外人	(6)
第二章 社会学研究纲领	(24)
一、社会学作为一种视角	(25)
二、社会学研究社会互动	(27)
三、社会学的问题领域	(32)
四、社会学分析范式	(42)
第三章 现代性的诊断	(58)
一、社会分化	(62)
二、货币经济	(73)
三、都市生活	(81)
四、文化冲突	(91)
第四章 社会学片断	(107)
一、社交：社会交往的游戏形式	(108)
二、社会美学	(122)
三、外来人	(131)
四、情感	(144)

五、社会空间	(158)
六、秘密与秘密社会	(165)
第五章 影响与回应.....	(193)
主要参考文献.....	(207)

序　　论

齐美尔,在同时代人眼中,就是一个“不易归类的使人不安而又令人着迷的形象”。^①长期以来,社会学界贴在齐美尔身上的标签,也是多种多样,或称其为“形式社会学家”,或称其为“微观社会学家”,或称其为“互动论者”,或称其为“唯美主义者”,或称其为“印象主义者”。当前比较时髦的“封号”还有“社会学的游手好闲者”、“早熟的解构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每种标签,代表了一种把握齐美尔思想实质的尝试。但一个学者获得如此之多的称号,恐怕也不多见,从中折射出各个时期的学者对齐美尔大相径庭的态度。同时,也表明齐美尔思想的复杂性。甚至有人断言:“并不存在本质的齐美尔,只有站在当代话语形态中的不同立场上解读出来的不同齐美尔。”^②若是真有可以不断重新诠释的潜力,那么,齐美尔自己必须是一个“取之不竭的人物”(an unexhaustable human being)。确实,从社会学对齐美尔的接受史来看,尽管可能除了二战前后的德国和20世纪初期的美

① 科塞,《社会学思想名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版,第213页。

② D. Weinstein & M. A. Weinstein, Postmodern(ized) Simmel, p. 55. London: Routledge, 1993.

国芝加哥学派之外，齐美尔未曾占据过社会学领域的中心地位，但是每代学者，倘有真心访求者，还没有从他那里失望地空手而回的例子。这位与主流社会学总是若即若离的“寂寞高手”，还经常给人这样的感觉，即“我们中的不少人在社会学理论的旅程中已经发现，齐美尔的形象经常出现在接近旅途尽头的地方。我们既沮丧又崇敬地向他致意，因为他正从我们仍在奋力前行想要到达的终点回来了”。^①或许是由于这种酸涩的心态，导致了这种结果：“就像弗洛伊德一样，齐美尔有许多学术子嗣。但并不是他们中的所有人都聪明到能够认出他们的父亲来”。^②此语虽然稍嫌刻薄，但在社会学中对齐美尔“明取暗窃”的现象，不在少数。当然，有些人可能确是独自重新发现了齐美尔已经提到过的观点，有些人可能对齐美尔零星的论述进行了更为系统的罗列。不过，若从学术思想的优先权来看，我们对于齐美尔的承认，还是欠缺太多。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社会学界对齐美尔基本上是采取“拿来主义”的做法，即毫不客气地从齐美尔的著作中“各取所需”，有时也不管是否曲解了原意。80 年代，齐美尔终于迎来了“迟到的复兴”(a belated renaissance)。^③这个“迟到”，显然既是针对更早一些的“韦伯复兴”而言，也有早该如此的意思。在德国，齐美尔的许多著作，包括一些长期遭到忽视的，重新出版了。计划中共有 24 卷的批判版全集，已于 1989 年推出了第一卷。在英语世界，复兴的“准备工作”其实在 70 年代末期就开始了。齐美尔的《货币哲学》、《历史哲学问题》以及有关“社会科学

^① See D. N. Levine (ed.), Georg Simmel: On Individuality and Social Forms, pp. lix–lx.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1.

^② See D. Frisby(ed.), Georg Simmel: Critical Assessments, Vol. 3, p. 354. London: Routledge, 1994.

^③ ibid. p. 113.

中的解释”、“妇女”之类当代热门话题的论述，相继被译成英文。1991年，还有了一份齐美尔研究同好们交流信息的专门刊物，即《齐美尔通讯》(Simmel Newsletter)。新版或新译的著作，以及各种重新阐释，使齐美尔以一种新形象出现在当代学者的面前。更重要的是，它们激发了人们从根本上来完整理解齐美尔的好奇心。而这种努力在以前几乎付诸阙如。但齐美尔似乎又太难把握了，就像目前许多飘忽不定、闪烁其辞的后现代论者一样。有人还真专门写了一本书，题目也带有后现代的味道，叫《后现代(化了)的齐美尔》[英文即 Postmodern(ized) Simmel]。作者将齐美尔称为后现代社会学家的理由如下：首先，齐美尔反对总体化的倾向，实质上是要消解现代性。所以，作为一个随笔大师和讲故事者，他只致力于探讨社会世界的具体问题，而对建构社会世界的总体性，则不感兴趣。其次，齐美尔好似一个漫无目标的游手好闲者(*flaneur*)，东看看，西瞧瞧，凡是能够让他感到惊奇和能够逗他开心的事情，都要观赏和把玩一下。所以，齐美尔在其学术生涯中，谈论过许许多多的社会现象，完全随兴之所至。这种取向也就使他远离一种总体化的观点，而去关注一些离散的但却重要的因素。最后，齐美尔就好像一个能工巧匠，善于充分利用手边现成的材料，甚至边边角角，补缀出一件件精致的作品出来。作为现代性碎片的收集者，他总是从别人熟视无睹的事情(不少还是正统的学者不屑谈论的话题，比如调情、卖淫)中，发掘出人所未见的含义。齐美尔的表述风格在经典社会学家中独树一帜。“他的大部分书都是由篇幅不大的结构并不严谨的文章编集而成。每一篇文章如同一件艺术品。”^①但从社会学共同体的学术规范来看，这种不讲系统、极少注解的文风，却有“离

^① 参见《桥与门——齐美尔随笔集》，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304页。

经叛道”之嫌。即便敬仰齐美尔如科塞者，也不免抱怨：“不论是由于没有耐心，还是没有能力较长时间地集中注意力于一个特定的问题，他总是从一个话题跑到另一个话题，从一条推理思路转移到另一条思路。”^①在科塞等人看来，齐美尔作为一个科学家颇有不胜任的地方，为弥补这种缺憾，他们遂将齐美尔大肆整饰，改装出条理分明的命题体系。但时至今日，极少有人再把齐美尔的这种片断性的随笔手法，视为是一种无能或失败了。相反，他们或者认为，齐美尔的著作并不像表面所看到的那样七零八落、杂乱无章，而是有着内在的逻辑和统一的红线，也就是说，要远比人们原先认为的具有系统性，因此，不少人致力于将之整合为一个完备的理论体系；或者认为，齐美尔选择这种研究和表征策略，实是大有深意，因为碎片性是齐美尔所关注的对象本身的特征，故此，任何将之系统化的企图都有悖于齐美尔的初衷，正确的做法是在完全肯定的立场上去揣摩这种策略的含义。我们认为，齐美尔的著作，应当看作是一个自由心灵的自由创造。就其创新性而言，确实是无需参照前人的结果；就其自足性而言，也无需他人的证实。以随笔的方式呈现，是因为“随笔不遵循组织化的科学和理论的游戏规则……它使事物的秩序等同于观念的秩序”。^②而在具体写作中，齐美尔似乎与本雅明后来所倡导的立场不谋而合，即“作家应该在写完每一句子后停下来，然后重新开始”。^③视角的不断移换，使齐美尔的著作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同时，让人不得不佩服其想象力之丰富和洞察力之敏锐。

① L. A. Coser(ed.), Georg Simmel, p. 3,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5.

② See D. Frisby, Sociological Impressionism, p. 71, London: Routledge, 1992.

③ 转引自刘北成《本雅明思想肖像》，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94 页。

在齐美尔，思考和写作乃是彰显存在之个体性的方式。阿隆在评价韦伯时曾说，比起迪尔凯姆或帕累托，韦伯更是我们的同时代人。^①我们认为，这一评价同样适用于齐美尔。若就思想中所含的后现代气质而言，齐美尔可能比韦伯更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当然，对于齐美尔这样“一个有着无穷创新思想的人”，^②在这本“引论”中，我们不可能面面俱到地进行阐释，而只能报告我们与他初步“对话”的印象，并且仅限于社会学方面。就是在介绍齐美尔的社会学时，我们也只是力图勾画出个性轮廓，尤其是独特的提问方式和运思过程，希望以此来激发人们阅读齐美尔的兴趣。

① [法]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596页。

② Robert K. Merto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p. 404, New York: Free Press, 1968.

第一章

学院里的局外人

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于1858年3月1日出生在柏林市中心,莱比锡大街和腓特烈大街交叉口的西北角。出生的时间和地点,似乎注定他要同社会学发生联系。是年,法国社会学大师迪尔凯姆也诞生了;而柏林,是19世纪末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随着齐美尔的成长,也变为世界性的大都市,上面提到的两条大街,后来则变为柏林最繁华的商业街。齐美尔一生的绝大部分时光,都是在柏林度过的,因此,齐美尔可以说是现代都市的产儿,一个地地道道的现代人。敏锐的心智,再加上现代都市的社会背景,使得齐美尔能够“在20世纪还没发生以前,就已解释了它”。^①

一如齐美尔的著述风格,他的作品多是片断性的随笔,而且几乎没有注脚,有关他的生平,特别是家庭背景,后人所知道的,也是一些片断性的资料。据他的儿子汉斯(Hans)回忆,齐美尔“没有兴趣——甚至反感于——将自己与其先辈的历史联系起来”,“只是在极为偶然的情况下,他才谈及早年的情形。”^②齐美

^① D. N. Levine, Simmel as a Resource for Sociological Metatheory, *Social Theory*, 1989, Vol. 7, p. 173.

^② D. Frisby, *Sociological Impressionism*, Routledge, 1992, p. 14.

尔似乎刻意想要忘掉自己的出身，避免与祖先的传统发生联系。这是事出有因的：他是一个犹太人。

齐美尔的父母都来自布勒斯劳，一个位于波兰西南部的犹太人社区。在他们结婚并移居柏林之前，母亲已经皈依新教，而父亲则改宗天主教。齐美尔是他们七个孩子中最小的，随母亲的信仰接受了洗礼。尽管如此，齐美尔的犹太人出身，还是在后来的学术生涯中给他带来了诸多的烦恼与失意。不过，齐美尔似乎并不由此而埋怨自己的血统，因为他曾有一次向著名的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 1878—1965)表示：“我们确实是一个杰出的民族。”^①

尽管家境尚算富裕，但齐美尔的童年不能说是特别的快乐。也尽管齐美尔后来表现出极为广泛的研究兴趣，从音乐、诗歌，到绘画、戏剧，几乎无不涉猎，但按齐美尔自己的说法，在他父母双方的家庭中，都缺乏一种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文化氛围。所有的文化兴趣，都是靠他自己钻研和与其他社交圈子接触而激发出来的。

在齐美尔 16 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家庭的一位好友，也是一名成功的音乐出版商，充当了齐美尔的监护人，并赠予他一笔可观的财富。正是这笔财富，为齐美尔日后过着舒适的资产阶级生活，并在未能及时获得应有的学术地位时仍能潜心于学术研究，奠定了“物质基础”。为表感激，齐美尔后来将博士论文题献给他。

1876 年，在大学预科毕业以后，齐美尔进入柏林大学就读。据说齐美尔也曾想像当时的其他青年一样，首选到外地去求学，无奈对他宠爱有加而又专横嫉妒的母亲将他束缚住了。不过，当

^① J. Wentle, Dictionary of Modern Culture, p. 365.

时的柏林大学确也是精英荟萃，名流济济，足以让齐美尔的兴趣“游刃有余”了。起先，他在著名史学家蒙森(T. Mommsen)门下研习历史；接着，转向了心理学，师从著名民俗心理学家拉扎鲁斯(M. Lazarus)；再后，又追随巴施蒂安(A. Bastian)钻研民族学；最终，还是在泽勒(E. Zeller)和哈姆斯(F. Harms)的指导下，专攻哲学。

1880年，齐美尔提交了一份题为《有关音乐起源的心理学和人种志研究》的学位论文，但是遭到拒绝。据齐美尔专家弗瑞斯比(D. Frisby)考证，此文颇具首创性，其中甚至还包含了最早的问卷调查之一。^①问题大概也就在“未循学术惯例”，加上不少的拼写和格式错误。又据后来的笔迹学分析，齐美尔在22岁时就已形成独特的个性。不过，功成名就、循规蹈距的教授们，似乎难以欣赏。作为评委之一的赫尔姆霍茨(Helmholtz)就认为：“如果我们不鼓励他在这个方向上走得更远，将是对他的莫大帮助。”^②不管怎样，在1881年，齐美尔终于以一篇两年前曾经获得过学术奖、题为《康德有关物质的诸种观点述评》的论文，拿到了哲学博士学位。

1885年，经过必要的程序，齐美尔获得了担任柏林大学编外讲师的资格。这种职位，校方不付工资，收入全靠听课学生所缴的学费，处于大学等级制度的底层。而才华横溢的齐美尔在这个位置上，一呆就是15年！

1890年，齐美尔与格特鲁德·琴娜(Gertrud Kinel)结婚。格特鲁德·齐美尔也喜欢哲学思考，以笔名玛丽一路易丝·恩肯朵尔芙发表了不少有关宗教和性问题的文章，并且还是一位

^① D. Frisby, Georg Simmel, Ellis Horwood Limited, 1984, p. 23.

^② ibid. p. 23.

成功的学术沙龙的女主人。他们的婚姻应属“志同道合”，比较和谐。不过，齐美尔似乎不愿为任何“形式”所拴住，据说他曾同另外一个也颇有学术造诣的女子生过一个孩子。

也在 1890 年，齐美尔第一部社会理论方面的著作《论社会分化》问世了。该书的副标题是“社会学与心理学的探索”，其中第一章专门讨论“社会科学的认识论”。此书代表了齐美尔将社会学确定为一门独立学科的首次尝试，但尚未明确形成自己独特的社会学思想。正如兰德曼(Landmann)所言：“青年齐美尔是从实用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斯宾塞的进化理论和分化原则出发的。”^①

不过，若从社会学方面的努力来说，齐美尔早在 1887 年就开设了名为“从社会学问题的角度来看伦理学”的课程。到 1894 年，则径直以“社会学”为名来开设课程。(此后直到 1908 年，齐美尔每年都要讲授这门课程。)同年，齐美尔还发表了一篇极为成功的文章，即“社会学问题”。此文包含了齐美尔的研究纲领，并在第二年被译成英文。在 1895 年齐美尔写给法国社会学家布格莱(Bougle，此公是迪尔凯姆与齐美尔发生学术联系的主要中介)的信中，就坦率地表示：“我把这篇小文章视为我所写过的东西中最有价值的一篇。”^②

在这段时期，齐美尔与社会学关系密切的著作，还包括《历史哲学问题》(1892 年，此书涉及诸多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问题，对韦伯影响甚大)和《伦理学导论》(两卷本，分别刊于 1892 年和 1893 年)。当然，精力充沛、创造力旺盛的齐美尔，并没有把自己的兴趣局限在社会学领域，他还关注其他哲学问题。在自我认同

^① D. Frisby, Georg Simmel, Ellis Horwood Limited, 1984, p. 23.

^② ibid. p. 51.